

沅君幼年轶事

冯友兰

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沅君生来不吃鸡蛋，不但不吃而且厌恶它。她要是不喜欢一个人，就说给他个鸡蛋吃。我们生活在祖父的大家庭里，全家二三十口人，大锅饭只供给主食和一般的副食——如炒白菜，腌萝卜之类，别的吃食由各房自理。母亲自己腌鸡蛋，每天早晨煮一个由我和弟弟景兰分食。景兰喜欢吃蛋白，我就吃蛋黄。沅君能吃饭了，但不吃鸡蛋。我们三个小孩，倒各得其所。母亲不忍，百般劝诱，也没生效果。

1907年，父亲在湖北崇阳县做知县，我们这三个小孩都跟着到崇阳。父亲给我们请来个教书先生，设了一间书房。我们这三个孩子分成两班。我和景兰为一班，沅君六岁，一个人一班。功课只有国文、算学两门。父亲认为这两门是一切学问的根本，必须在小的时候把根基打好。先生教算学要用黑板、粉笔。粉笔在崇阳买不到，就写信托在汉口的亲友去买。当时粉笔称为粉条，汉口的人托人捎回来一大包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吃的粉丝，粉丝也叫粉条。

有一天，沅君写大字，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，沅君生气了，第二天就不去上学。母亲生气地说，不上学，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。她宁愿上小黑屋，也不去上学。母亲劝说解释，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，先生也出来接她，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，沅君性格

之犟强，可见一斑。

不久，父亲去世，我们回到唐河老家，母亲坚持父亲平常的教训：必须将国文底子打好。给我们请来先生在家里上学。可是沅君没有上学，因为当时的规矩，女孩子是不上学的。一直到1916年夏天，我从北京大学回家过暑假，沅君跟着我又开始读书。那时候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学生，文风是学魏晋。我就在这一方面选些文章，叫她抄读（当时家里只有“四书”之类有限的书）。她真是绝顶聪明，只用了一个暑假，不但能读懂那些文章，而且还能摹拟那些文章写出作品。到1917年暑假，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专修科，消息传到唐河，她就坚决要到北京应考。当时我们家乡较偏僻，风气闭塞，把女子读书视为荒唐事，但沅君很勇敢，母亲也排除各种非议，自己承担责任，支持她前往。暑假终了，我同景兰、沅君就一同到了北京。

沅君到北京果然考进了当时北京的女子最高学府的国文专修科，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当时开始学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，不久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，改写语体文创作小说了。毕业后，她又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，学会了考据、研究的一套方法，这就是她后来所走的那两条路，一条是创作，一条是研究。

沅君曾作有一篇《秋思赋》，大概是她在国学专修科中的作品。颇有六朝小品

的神韵，景兰会画中国画，画有一幅“秋满山皋图”，把沅君的这首小赋写在空白的地方，作为题词。我也作了一首诗，这幅画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。画固然不可再见，赋的原文也不记得了，只有我的诗还记得。诗曰：

秋意满山皋
吾弟妙挥豪
树林忽疏阔
花丛骤寂寥
若非严萧瑟

何以续清高
寄语同怀妹
悲秋毋太劳

如果这幅画能够保存下来，倒是我家的一段佳话。

沅君摹拟古典文学的作品，大概相当多。有些可能失于幼稚，但有些也可以显示她的才华和聪明。可惜她自己不知爱惜，像我们这些人在当时也不知保存，现在竟然一篇也看不见了，真可惋惜。

冯沅君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

——为纪念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

张 忠 纲

冯沅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戏曲史家。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，作出了卓著的贡献，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视和赞扬。她的论著较多，计有《中国诗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简史》、《南戏拾遗》（以上均与陆侃如先生合著）、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（与游国恩先生等人合编）、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与林庚先生主编）、《古剧说汇》等，曾单独出版过的《古优解》和其它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古典文学论文，则大多被收进袁世硕同志编辑整理的《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》中。先生学贯中西，博通古今，研究范围很广，而尤精于词曲。对于先生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研究，我作为她的学生，才疏学浅，实不敢窥其堂奥，只是在学习了先生的著作之后，结合先生平日对我的教诲，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。

我做先生的研究生时，先生经常教导说：做学问“功夫要死，心眼要活”。所谓“功夫要死”，就是要肯下苦功，博览穷蒐，精严审慎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、深、透、熟。所谓“心眼要活”，就是要肯动脑筋，善于思考，有所创见，不能因袭成说。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、新、真、准。这可说是先生的“治学三昧”。

先生治学严谨，实事求是，从不发无据之论。她做学问，第一步就是详细地占有材料。为了研究某一个问题，她博览群书，蒐罗爬梳，把一切有用的材料都一一记录下来，然后抉幽显微，辨伪存真，排比推论，做出自己的判断，提出个人的见解。先生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如遗留下来的《东山杂录》、《己卯从录》、《涪